

軍事互信機制下軍事熱線之研析

陸軍中校 李彥璋

提 要

軍事熱線措施屬於信心建立措施(C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CBMs)的溝通性措施。溝通性措施是指在有衝突傾向或緊張關係的國家之間維持一個溝通的管道，作為危機來臨時，有助於化解緊張衝突的溝通管道。建立熱線被認為是CBMs的重要項目之一，其目的是建立兩個對立國家軍事部門間的通報系統，避免意外發生，而穩定兩個敵對國家間的軍事關係，進而發展出可預測的行為，也可以運用成為相關各國提出質疑，避免產生危機的管道。本文首先概述軍事互信機制之意涵，藉由國際上設置軍事熱線的實踐經驗進行分析，再進一步綜合研判，探討兩岸建構軍事熱線的可行性，冀望透過資訊交換、對話，以及限制武力等途徑來強化兩岸的互信，進而得以穩定局勢並且邁向和平。

關鍵詞：信心建立措施(CBMs)、軍事互信機制、軍事熱線

前 言

近年來，亞太地區的局勢及紛爭漸趨嚴重，而主因正是美國的戰略轉變，2011年11月，歐巴馬政府的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期刊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America's Pacific Century)文章，強調亞太的重要性，宣布美國的軍事和外交重心將從歐洲轉移到亞洲，

特別是亞太(Asia-Pacific)地區。¹從此，「重返亞洲」(pivot toward Asia)和「亞太再平衡」(rebalance toward Asia)成為美國外交的核心。美國的戰略轉變，使得亞洲重新成為國際關注的新焦點。²由於亞洲地區缺乏如同歐盟般的安全整合機制，在面對朝鮮半島核武危機、臺海地區問題與南海地區主權爭端議題上，成為區域衝突或戰爭地區之熱點。³況中共在實際上的軍事和戰略意圖始終隱而

1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2011, pp.1-11. Hugo Meijer, The Reconfiguration of American Primacy in World Politics: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US Rebalance toward Asia, New York : Springer Nature Press, 2015, pp.1-27.

2 Daniel Wei Boon Chua, America's Role in the Five Power Defense Arrangements: Anglo-American Power Transition in South- East Asia, 1967-1971,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s, Vol.39, No. 4, 2017, pp.615-637.

3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2, 1997, pp.26-30.

未喻，也在未來的發展上增加此區域的諸多變數，因此如何透過信心建立措施減少誤會及衝突的可能，並進而建立軍事熱線的溝通管道，降低及和緩兩岸的緊張情勢，創造雙贏的局勢，維護區域和平，其重要性莫可言喻。

軍事互信機制之意涵

軍事互信機制之意涵來自於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以下簡稱CBMs)，而必先以CBMs之起源為架構，再就其功能與種類加以分析，方能進一步延伸探究軍事互信機制之意義。

一、軍事互信機制之緣起

CBMs係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為了預防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及以蘇俄為首的「華沙公約組織」(The 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 WTO)兩大強權因互信基礎薄弱產生衝突的可能，並降低敵對國家間緊張對峙情勢並避免軍事衝突之機制。⁴1962年10月16日至28日古巴飛彈危機促成美、蘇兩

國建立各種溝通管道的起點，雙方認識到惟有降低敵意，方能避免東西方間的大規模戰爭，甚而避免擴大為全球性戰爭，遂於1963年6月20日，達成《熱線協議》(The Hot Line Agreement)，成為CBMs的雛型與先趨，其主要功能在於藉由軍事透明化，辨識潛在對手的意圖與威脅，避免因誤判或誤解而造成不必要的衝突與對立，⁵而國際對峙情勢也因此逐漸趨向和緩。

CBMs一詞最早在1975年8月1日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召開的「歐洲安全合作會議」中所提出，並決議通過《赫爾辛基最後議定書》(Helsinki Final Act)，其中最重要的法案就是《信心建立措施暨特定層面安全與裁軍法案》(Document on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and Certain Aspects of Security and Disarmament)，率先發展出CBMs的概念及主要定義，即「在可接受的情況下，進行各種軍事演習(maneuvers)和軍事活動(movements)的預先通告、互派觀察員、軍事人員的邀請交換和軍事代表團的拜訪交換等活動，以增強雙方信心、穩定與安全。」⁶其後又在1986

4 Joseph L. Sheffield, Military- to- Military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labama: Air 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 Air University Maxwell Air Force Base Press, 2009, pp.7-8.

5 Holly Higgins, Applying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in a Regional Context, New York: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ess, 2002, p.109.

6 Helsinki Final Act, in a Handbook of Document on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and Certain Aspects of Security and Disarmament, Washington, D. C.: OSCE, 1975, pp.10-13. David H. Capie, Paul M. Evans and Akiko Fukushima, Speaking Asia- Pacific Security: A Lexicon of English Terms with Chinese and Japanese Translations and a Note on the Japanese Translation, Toronto: Center for Asia - Pacific Studies, 1998, pp.33-34.有關信心建立的措施共12條，包含軍事演習的事先告知、軍事演習區域的事先通報、邀請他國觀察員到本國觀摩軍事演習、軍事調動與主要部隊移防的事先告知。



年的「斯德哥爾摩信心與安全建立措施文件」(Stockholm Document of Confidence and 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建構更為具體與管制性的內容，CBMs也擴展為「信心暨安全建立措施」(Confidence and 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 CSBMs)，⁷成為現代國家或區域間普遍用來降低緊張局勢進而避免軍事意外衝突的機制，目的在透過公開的軍事交流與資訊交換，增進區域的穩定與安全，藉合作關係的維繫以減少誘發衝突，並建立預防及解決的重要機制。

大體而言，CBMs可區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類型，廣義的CBMs可涵蓋不同的領域，如政治、經濟、軍事與人道交流等環節，或許有些與安全沒有直接的關聯性，但是，在整體上間接對增進區域的信心及安全，可能超過那些特地為促進信心與安全而設計的措施；⁸至於狹義的CBMs則是與軍事、安全有直接相關而增加信心及安全的作為。⁹軍事互信機制屬於狹義的CBMs，有別於其他領

域互信機制，其他類型的CBMs雖可降低雙方敵對意識，卻不一定如「軍事互信機制」具有化解危機和防止戰爭的功能。¹⁰「軍事互信機制」可視為是軍備管制的一種型式，藉由設計且明確的合作方式，促使各方參與者的軍事意圖更加清晰，藉以降低軍事行動的潛在威脅，並制約對手發動奇襲或是武力威脅。¹¹由此可知，CBMs可以是軍事領域或非軍事領域，是國家間用來降低緊張局勢並避免衝突危險的工具，並不是直接用於解決已發生的衝突或對立，而是建立一套架構來避免或降低由於不確定和誤解所產生的衝突或對立，其功能在於增加軍事活動的透明化(transparency)，以協助各國區分自己對於一個實在或潛在對手對意圖或威脅的恐懼到底有沒有根據，¹²並運用相關措施與方法促進相互瞭解，以避免不必要的誤會與對立。

二、軍事互信機制是狹義的信心建立措施機制

美國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7 Victor Yves Ghebail,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Defusing the Cold War, in a Handbook of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for Reg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 C.: 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1998, pp.247-255.

8 吳建德、張蜀誠、王瑋琦合著，《柳暗花明：兩岸軍事互信與和平協議之路》，〈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頁11-12。

9 M. Susan Pederson and Stanley Weeks, A Survey of Confidence and 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 in Ralph A. Cossa ed., Asia Pacific Confidence and 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 Washington, D. 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5, pp.82-83.

10 Bonnie S. Glaser, Cross-Strait Confidence Building: The Case for Military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Santa Barbara: Greenwood Publisher Group, 2005, pp.157-158.

11 Simon J. A. Mason, Matthias Siegfried,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CBMs) in Peace Processes, in Managing Peace Processes: Process related questions, A handbook for AU practitioners, Switzerland: Centre for Humanitarian Dialogue, 2013, pp.57- 59.

12 楊永明、唐欣偉，〈信心建立措施與亞太安全〉，《問題與研究》，第38卷，第6期，1999年，頁2。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關於「軍事信心建立措施」(Military Confidence and 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 MCBMs)或稱「軍事互信機制」的定義為：泛指處理、防止或解決國家間不確定性的一種措施，設計目的在於防止不必要的敵對行動，建立相互信任機制，也可以是國家或非政府組織，為了特別去處理和致力解決長期政治僵局的一種方法，主要應用於預防世界各地的衝突。¹³主要目的在於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措施來澄清軍事活動的意圖，降低引發緊張情勢的根源，增加軍事活動可預測性及規範性，從而強化雙方的信心和安全，為一種預防意外戰爭發生的機制。涉及範圍包括建立區域溝通中心、固定性協商、軍事演習之公告、設立非軍事區、檢證性措施、設置並建立領導人與雙方指揮中心熱線機制等項目，¹⁴其並非一蹴可幾，難易程度亦受各國與區域間之互動及國際局勢影響。

狹義的CBMs是與軍事、安全有直接相關而增加信心及安全的作為。¹⁵MCBMs著重於安全事務，學者湯紹成認為，軍事互信機制是藉由雙方或多方軍事交流的特殊安排，以

便增進理解，建立信任，避免誤判，以及降低衝突的可能性，進而達到結束敵對狀態與簽署和平協議的目的。¹⁶同時，軍事互信機制功能包括：一是保障功能，結束敵對狀態，為和平發展掃除障礙，提供保障；二是穩定功能，簽署相關協議，使軍事互信機制規範化、制度化。¹⁷

隨著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的新時期，兩岸政治互信不斷累積，可否參照國際現行機制與成功實例，在兩岸協商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議題，也日益成為熱門的話題，如何在現有的共識基礎上依階段逐步化解分歧，由廣義性的CBMs逐步延伸至狹義性的軍事互信機制，透過此機制來保證並降低緊張衝突及避免戰爭，突破現有僵局，強化區域間的信心及安全，實為重要的課題。

軍事互信機制之發展階段與類型

一、軍事互信機制之發展階段

美國學者克蘭普(Michael Krepon)基於國際軍事互信機制的演進，認為發展的過程採漸進的方式推動，且在初期成熟後，

13 Bonnie Glaser, Brad Glosserman, Promoting Confidence Building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ashington, D. 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8, pp.11- 12.

14 Zdzislaw Lachowski, Martin Sjogren, Alyson J. K. Bailes, John Hart and Shannon N. Kile, Tools for Building Confidenc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Sweden: Th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07, pp.8-10.

15 M. Susan Perderson and Stanley Weeks, A Survey of Confidence and 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 Washington, D. 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5, pp.82- 83.

16 湯紹成，〈略論兩岸軍事互信機制〉，《海峽評論月刊》，第219期，2009年，頁34。

17 徐曉迪，〈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功能、挑戰及建言〉，《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32期，2011年，頁54。



方進入次階段，可劃分為「衝突避免」(conflict avoidance)、「建立信任」(confidence building)及「強化和平」(strengthening the peace)等三個階段，¹⁸分述如下：

(一)第一階段：衝突避免(conflict avoidance)

任何CBMs的談判與執行都必需有要共同政治意願的支持。在不危及國家安全與國家利益，並使現有衝突惡化的前提下，對立雙方的政治領袖同意進行最基本與最初步的溝通與接觸，以避免對立情勢加劇，建立一個基本的安全網絡，防止突發事件演變成全面性的衝突。¹⁹提供彼此一段冷卻期(cooling-off period)，以供雙方思考或準備下一階段的接觸。

衝突避免措施的特色在於避免衝突雙方發生不預期的戰爭，及非蓄意的情勢升高之危險，²⁰可藉由雙方設置熱線、武器系統的公布及軍事演習的預先通知等透明化措施，均有助於達成。惟此階段並非希望即刻建構一套完整的計劃和步驟，而係為後階段奠定基礎，務實地避免衝突情勢發生。

(二)建立信任(confidence building)

在雙方獲得政治支持與良性互動後，已不僅是在避免突發的衝突和危機，而是要進

一步建構彼此的信任與信心。²¹不同於前階段較具臨時性，且易獲得成效，此階段需要更多的承諾與實踐，通常國內的障礙(如反對黨的杯葛、政經情勢的變動等)或重大的戰略問題(發展核子武器或軍事聯盟等)會造成阻礙。

(三)強化和平(strengthening the peace)

若能克服避免戰爭的重大障礙，並開始磋商和平協議，國家領導人就能繼續利用CBMs來強化和平。本階段之目的在擴大並深化既有的合作模式，並且盡可能創造強化和平的有利空間及進展。²²採務實漸進方式，由初階運作穩定成熟後逐步到更高階段。

表一 克蘭普軍事信心建立建制階段劃分表

項次	階段	說 明
第一階段	衝突避免	在不危及國家安全又不使現有衝突惡化的前提下，對立雙方的政治領袖同意進行雙向溝通，避免對立情勢加劇。
第二階段	建立信任	從第一階段發展到第二階段困難度最高，雙方需有更強化的政治支援與良性互動，並進一步建構彼此的信任與信心。
第三階段	強化和平	克服避免戰爭的重大障礙並開始協商和平條約，本階段目的在擴大並深化既存的合作形式，並儘可能發展穩健的實質進展。

資料來源：Michael Krepon, Khurshid Khoja, Michael Newbill, and Jenny S. Drezin, A Handbook of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for Reg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 C.: The Stimson Center, 1998, pp.4-7.

18 Michael Krepon, Khurshid Khoja, Michael Newbill, and Jenny S. Drezin, A Handbook of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for Reg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 C.: The Stimson Center, 1998, pp.4-13.

19 林正義，〈台海兩岸『信任建立措施』芻議〉，《國防雜誌》，第13卷，第12期，2003年，頁4-5。

20 James Krask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Security: The Role of Transboundary River Agreements as a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CBM) in South Asia,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8, 2003, pp.468-469

21 Joseph L. Sheffield, op. cit. pp.8-10.

22 Michael Krepon, Khurshid Khoja, Michael Newbill, and Jenny S. Drezin, op. cit. pp.4-13.

就困難度而言，從第一階段發展到第二階段係由衝突轉入互信，困難度最高；而第二階段發展到第三階段則屬互信機制的強化，困難度相對較低，而前述三階段在性質上屬於國際關係理論中「預防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概念的延伸，因為衝突會影響到雙方或區域國家的安全與利益，分階段執行，成功概率將大幅提升，而利益攸關的國家，也會有較高的意願來執行。

二、軍事互信機制之類型

欲理解軍事互信機制之演進軌跡、發展類型與發揮的功能，應先從CBMs之各種實際操作措施及內涵去理解，才能從過往的經歷推展出符合具兩岸特色的軍事互信機制。

(一)軍事互信機制的演進

CBMs的概念強調各國應透過接觸、交流等各種建立互信的方式，以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從歐洲CBMs長久下來累積協商、談判的成果及其演進，可看出經由具體的限制性措施、信息的交換及查證等措施，將各種作為規範化並制度化，可作為軍事互信機制類型的參考模式。

CBMs演進過程是以軍事面作為基礎，進而建立各國之間的協議，可歸納出以下特點：²³

1.避免衝突升高

各國之間都必須先有追求和平的共識以及誠意，承認邊界的控制及對等的現狀，就

算雙方在主權議題上有所爭端，不可貿然以此作藉口開啟爭端。

2.開啟溝通管道

確立溝通管道的流暢，避免危機的發生及其應變措施，以歐洲信心建立措施初期而言，國與國之間以外交對話、人員、熱線交流為主，後期溝通管道穩定之後，建立定期性的協商機制，使每一國家都能相互討論及預防危機的發生。

3.強化檢證措施

早期的CBMs並未涵括限制性措施與強制性措施，避免過多要求或義務性質而降低各國參加的意願，但為使軍事相關資訊能更加透澈化，軍事活動更能預測與推演，以避免誤解而發生衝突，藉由演練活動的限制與相互檢證的過程，降低國家之間的蓄意欺騙，使信心建立措施更加強化。

(二)軍事互信機制的類型

國際間對於安全的應對有多種方式，而發展的CBMs亦有多種類型，俾利充分發揮區域性組織或相互間之協定，以因應各種威脅，降低緊張關係，確保和平與安全目標的達成。前聯合國秘書長蓋里(Boutros Boutros-Ghali)在1990年「防禦性安全概念及政策研究」報告中，將CBMs區分為資訊性措施、溝通性措施、接近性措施、通知性措施及限制性等五種類型。²⁴

上述幾種CBMs的概念與作為，是經由

23 Simon J. A. Mason, Matthias Siegfried, op. cit. pp.59-61.郭臨伍，〈信心建立措施與兩岸關係〉，《戰略與國際研究》，第2卷，第1期，2000年，頁135-136。

24 Boutros Boutros-Ghali, Study on Defensive Security Concepts and Politic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3, pp. 33-35.



歷史經驗累積歸納而來，有些措施在意義上或有類似或重疊處，但在邏輯上並無互相排斥，而為利簡化且易於劃分，本文在論及軍事互信機制時，以Michael Krepon所提出之架構作分類，藉由溝通、透明、限制及驗證性措施，促進國家間的溝通與互信，並建立國家軍事行動的模式或規則，以降低軍事緊張、誤判與避免錯估危機的有效管道。

軍事熱線之國際成功經驗—古巴飛彈危機

軍事熱線措施屬於CBMs的溝通性措施。溝通性措施是指在有衝突傾向或緊張關係的國家之間維持一個溝通的管道，作為危機來臨時，有助於化解緊張衝突的溝通管道。²⁵建立熱線被認為是CBMs的重要項目之一，其目的是建立兩個對立國家軍事部門間的通報系統，避免意外發生，而穩定兩個敵對國家間的軍事關係，進而發展出可預測的行為，²⁶也可以運用成為相關各國提出質疑，避免產生危機的管道。

根據歷史經驗，兩個國家建立熱線，通常曾經發生過衝突或危機，在情勢急迫情況下，必須尋求緩和與解決之道。其次，就是

這兩個國家或組織都不想動武，或暫時不想動武，均贊同致力和平的主張，因而形成建立熱線的動機。²⁷世界各區域或不少國家間都會以預防衝突為起點，建立起屬於該區域或特定國家間的CBMs，藉由國際上設置軍事熱線的成功經驗進行分析，再進一步綜合研判，探討兩岸建構軍事熱線的可行性，冀望透過資訊交換、對話，以及限制武力等途徑來強化兩岸的互信，進而得以穩定局勢並且邁向和平。

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堪稱國際衝突研究領域中的經典案例，被視為冷戰時期中最為嚴重的軍事對抗，也因為該危機，使美、蘇兩國元首認為有必要建立溝通聯繫的管道，而透過相當程度的溝通，亦可化解可能引發戰爭的誤解，減少衝突的發生。而半個多世紀以來，各國因應不同的實需，也都建立了不同層級的熱線，降低或減少可能爆發的潛在衝突，可見熱線對於國際和平有相當程度的貢獻。

1962年10月16日，時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Bundy告知Kennedy總統，中情局透過U-2偵照機判斷，蘇聯已在古巴設置具攻擊性的「中程彈道飛彈」(Medium Range Ballistic

25 Michael Krepon, Khurshid Khoja, Michael Newbill, and Jenny S. Drezin, *A Handbook of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for Reg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 C.: The Stimson Center, 1998, pp.4-13.

26 Davinder Singh, "Hotline Communication: A Strategic Necessity" in Timothy R. Heath ed., *Developments in China's Military Force Projection and Expeditionary Capabilities*,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6, pp.77-78.

27 Joseph L. Sheffield, *Military-to-Military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labama: Air 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 Air University Maxwell Air Force Base Press, 2009, pp.10-11. 沈明室，〈互信或防範？美中建立軍事熱線的意涵與挑戰〉，《戰略安全研析》，第32期，2007年，頁13-16。

Missile)且射程已涵蓋華府。²⁸Kennedy總統即刻成立「國家安全會議執行委員會」(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ExCOMM)²⁹分析研判策略。

10月18日，Kennedy總統透過與蘇聯外交部長Gromyko會晤之機會，並透過不同的管道向Khrushchev總理傳遞其不會進犯古巴的意圖，並重申美國不會容許蘇聯在古巴設置攻擊性武器。10月22日當ExCOMM成員討論擬訂Kennedy總統當晚透過電視向全國通報蘇聯在古巴設置導彈的消息，並宣布將於24日上午10時實施海上封鎖政策，以阻止任何攜帶攻擊性武器運往古巴的船艦。但軍方始終堅持以飛彈空襲基地。儘管如此，晚間Kennedy總統仍透過蘇聯大使Dobrynin轉交私人信件給Khrushchev總理，說明美方對蘇聯在古巴設置飛彈的看法，除存在著武力恫嚇性質的意圖，但刻意隱瞞不欲發動戰爭的目

的，³⁰以免蘇聯誤判局勢而發動戰爭。

10月23日，Khrushchev總理聲明無法認同美國「海上封鎖」的片面決定，也呼籲美國「展現審慎並聲明放棄可能對世界和平造成毀滅性結果的行動。」³¹但蘇聯針對Kennedy總統的講話稿進行分析，美國實際上沒有宣布戰爭，而實行封鎖政策，也為以後的政治活動留下了更大的轉圜空間。

10月24日上午10時，實施海上封鎖之行動，戰略空軍司令部提高警戒級別至二級戰備狀態，並動員可以利用的資源來增加警戒能力，包括可用的800架B-47、500架B-52和70架B-58轟炸機，不論是尚未準備好的後備役軍隊，還是即將調整他用的，都一律進入地面警戒狀態，實行分散部署，其中90架B-52轟炸機攜行25-50千噸的炸彈在大西洋上空待命，49架B-52轟炸機攜帶182枚核武器隨時準備發起進攻；³²在警戒命令發出24小時

28 Sheldon M. Stern, *The Week The World Stood Still: Inside The Secret Cuban Missile Crisis*, Stanford: Th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8-10. McGeorge Bundy, *Danger and Survival: Choices About the Bomb in the First Fifty Yea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8, pp.301-303.

29 ExCOMM：1962年10月16日由甘迺迪召集之顧問所組成，ExCOMM是美國在危機期掌控美國反應與行為的決策核心主體，主要成員計有：副總統詹森(Lyndon Johnson)、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國防部長麥克那瑪拉(Robert McNamara)、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JCS)主席泰勒將軍(Maxwell Taylor)、國家安全事務總統特別助理邦迪(McGeorge Bundy)、財政部長狄倫(Douglas Dillon)、中情局局長麥康(John McCone)、司法部長羅勃甘迺迪(Robert Kennedy)、助理國務卿波爾(George Ball)、無任所大使湯普森(Llewellyn Thompson)、副國防部長吉爾派區克(Roswell Gilpatric)。另外非正式成員包括：副助理國務卿強森(Alexis Johnson)、國防部長助理尼茲(Dean Acheson)、前國務卿迪恩(Dean Acheson)、私人顧問麥克洛伊(John McCloy)、羅維特(Robert Lovett)、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史帝文森(Adlai Stevenson)、美國救生協會(USIA)副局長威爾遜(Donald Wilson)、美國國際事務助理國務卿馬丁(Edwin Martin)、前美國駐蘇聯大使波林(Charles Bohlen)，由甘迺迪主持。Ibid. pp.29-35.

30 Aleksandr Fursenko and Timothy Naftali, *Khrushchev's Cold War: The Inside Story of an American Adversa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7, pp.240-243.

31 Ibid. pp.477-478.

32 USAF Historical Division Liaison Office, *The Air Force Response to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Washington: Headquarters USAF Press, declassified by 2011, pp.8-9.



內，1,200架轟炸機攜帶172枚導彈和2,858件武器處於戒備狀態，90枚宇宙神、46枚大力神和12枚民兵洲際導彈也在發射臺就緒；海外陸上基地、航空母艦和潛艇也都作好應戰準備；61架加油機在空中待命，準備為轟炸機群提供加油服務。³³

10月25日，Kennedy總統在信件中，傳達美國要求蘇方儘速撤離飛彈與堅持海上封鎖行動的決心。Khrushchev總理主持召開中央主席團會議表示，情報說明Kennedy總統不會退縮，應採取靈活戰術，主動防止事態的失控，³⁴並與美國進行交易，以減少戰爭風險。

10月26日晚上，Kennedy總統收到Khrushchev總理的一封密函，「表示出對於危機的涵義有著完全合理的瞭解」，希冀若美國保證不入侵古巴，則蘇聯將自古巴撤出飛彈，³⁵敦促Kennedy總統審慎行事，保持克制。

然而，10月27日華府從莫斯科分社得知Khrushchev總理一改先前立場，透過廣播告知美國若將土耳其的導彈撤離，則蘇聯亦將卸除古巴的導彈作為交換條件。下午，美國兩架U-2偵察機遭古巴地面部隊擊落，其中一架飛行員當場死亡，美蘇兩國間敵意驟然升

高，國際緊張情勢劇增。

而短短26日及27日兩日情勢差異甚大，主因是Khrushchev總理沒有收到Kennedy總統對於26日信件的回應，便急迫地發出了第二封信，而且不用通常的外交途徑，卻是由莫斯科電臺廣播，而為了避免任何通訊上的延誤，美國政府同樣直接向媒體發布，對古巴使用軍事力量應當是最後的辦法。10月27日晚間，Kennedy總統派其胞弟Robert Kennedy與蘇聯大使Dobrynin秘密會面，而美國只針對10月26日的信件表示意見，同意保證不進犯古巴為條件以交換蘇聯自古巴撤離導彈，³⁶至於27日撤離土耳其之飛彈及U-2擊落事件則未提及，顯示出雙方為了世界的和平及國家的利益彼此讓步及妥協。

10月28日上午10時，Khrushchev總理緊急召開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會議，決定接受美國承諾不入侵古巴、蘇聯可以從古巴撤走導彈作為的妥協，考量到時間緊迫，Khrushchev總理除覆信給Kennedy總統，並透過莫斯科電臺廣播回應，儘早讓美國政府知道，避免美國對導彈基地發動攻擊。³⁷而Kennedy總統接受蘇聯的提議，長達13天的古巴飛彈危機，最終以和平的方式結束可能觸

33 Marc Trachtenberg, *Hist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54-255.

34 Aleksandr Fursenko and Timothy Naftali, op. cit., p.484. Khrushchev認為「撤出導彈並不意味著放棄古巴，如果美國保證不入侵古巴，蘇聯可以撤走中程導彈，而將短程導彈和巡航導彈留在古巴，這同樣可以加強古巴的力量，使它在今後2-3年內免受攻擊。」

35 Laurence Chang and Peter Kornbluh,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1962: A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ocument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9, pp.195-198.

36 Aleksandr Fursenko and Timothy Naftali, *One Hell of a Gamble: Khrushchev, Castro, and Kennedy, 1958-1964: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pp.273-274.

37 Ibid., p.284.

發核戰爭的危機。

在核子時代，危機的處理必然是危險、困難的和急迫的，在1962年10月古巴飛彈危機期間，美蘇除感受到和平與理性的必要性，另外最重要的是，當時溝通協調的途徑最快也要經過六小時才能使對方知悉，因此如何建立一個直接、秘密和迅速的溝通管道並傳遞正確的訊息是刻不容緩的。例如兵力的調度可經由溝通管道事先公告並通知，另外增強溝通管道與效果，也有助於危機的結束，³⁸雙方不致因誤會或其他突發事件而在缺乏溝通的情況下，爆發不必要的軍事衝突。

而美蘇兩國元首均認為有必要建立直接的聯繫管道，防範因軍事資訊欠缺引發誤解與誤判的可能性，因此在1962年12月12日，美國首先在聯合國十八國裁軍會議中，提出在莫斯科和華盛頓間建立可信任的「通訊聯結」的建議，³⁹包括不間斷的通訊功能以及可直接與政府元首溝通的管道。

1963年6月20日，為了在發生緊急情況

時，進行相當程度的溝通及信息的傳遞，⁴⁰化解美蘇對於核子大戰意外發生的恐懼，並使得兩國領袖得運用直接聯絡管道(Direct Communication Link)，⁴¹避免因通訊管道延遲所造成的溝通不良，消弭將全球推進至核戰邊緣的危機。美蘇兩國在日內瓦簽署《建立美蘇直接通訊聯結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Regar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irect Communications Link)，雙方同意在兩國政府間建立直接溝通的通訊聯結，保證快速向對方提供相關資訊，⁴²即所謂的「熱線」。其線路由蘇聯克林姆林宮連接至「國家軍事聯合情報中心」(the National Military Joint Intelligence Center)與美國「國家軍事指揮中心」(the National Military Command Center)，才接到白宮總統辦公室，此管道並非直通線，而是經過轉接式過濾的方式所設置。⁴³熱線的建立對於美蘇兩國元首在危機

38 William E. Odom, "The Origins and Design of Presidential Decision-59: A Memoir", in Henry D. Sokolski ed., op. cit., pp.187-188.

39 Jeffrey M. Elliot and Robert Reginald, The Arms Control, Disarmament, and Military Security Dictionary, California: Borgo, 1989, p.281.

40 Richard Ned Lebow & Janice Gross Stein,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68-69.

41 John Borawski, "The World of CBMs" in John Borawski ed., Avoiding War in the Nuclear Age: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for Crisis Stability, Boulder: Westview, 1986, pp.9-42.

42 Semyon Tsarapkin and Charles C. Stell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Regar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irect Communications Link, signed on June 20, 1963, at Geneva, Switzerland,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Vol.2, No. 4, 1963, pp.793-796. John Grenville and Bernard Wasserstein,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Treati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History and Guide with Tex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815.

43 郭添漢，《熱線——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建構》，〈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頁165。



期間進行磋商產生莫大的功能，如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時，美蘇雙方的戰略核部隊均處於戒備狀態，而以色列軍方又誤擊一艘美國通訊艦，美軍誤以為是蘇軍開始攻擊美國艦隊，因此立即命令美國第六艦隊前往地中海搜救與援助，雙方劍拔弩張，最後關頭，美蘇兩國使用軍事熱線，化解了蘇聯對美國海軍艦隊在地中海活動的疑慮，澄清彼此的意圖，再一次化解了一場核戰爭災難。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美國再次使用軍事熱線，避免了戰爭擴大的危機。而在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1982年美國進軍黎巴嫩等事件中，美蘇兩國也頻繁使用軍事熱線聯繫。而其他國家，如英、法殷鑑於此，亦分別於1966、1967年與蘇聯建立熱線，此機制的設立對於世界和平的貢獻產生莫大的功效。

軍事熱線之綜合分析——代結論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有許多國家運用CBMs的機制與方法，藉由敵對國家之間的軍事熱線、交流與合作，成功的化解了緊張的對峙關係，降低了誤判的可能性。而分析前述軍事熱線的實踐經驗，可歸納出以下幾點：⁴⁴

一、雙方需有政治善意為前提

CBMs最基本的前提條件是各方都不願意使衝突升級，彼此都有改善並建立積極關係的政治願望。如果任何一方沒有誠意，恣意擴大事態，都不可能建立有實質意義的信任措施，也就不可能產生改善安全的環境，⁴⁵而良好的政治願望及政治關係的緩和，是軍事熱線的前提。

此外，互信是一個逐漸累積的過程，可劃分若干階段實施，在實踐的過程中逐步提升、強化，並於各階段建立雙方軍事交往的政治基礎隨著CBMs的逐步推進，可逐步採取一些限制性措施，當然不可能要求雙方都不要對軍隊進行演訓，因此可在經由雙方同意下，採取一些限制雙方軍隊行動的方式，尤其是在邊境附近，使軍隊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以減緩緊張情勢；對於大幅度的部隊調動則必須事先以熱線通報對方，以防止大舉突襲的能力，因為這些舉措具有限制性及強迫性，僅具備初期懷有單純避免衝突願望是不夠的，必須代之以持續的、強大的政治願望的支持。⁴⁶

二、建立合適及定期溝通機制

敵對雙方透過友善政策的宣示，尊重彼

44 Bonnie Glaser, Brad Glosserman, Promoting Confidence Building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ashington, D. 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8, pp.13- 14. Bonnie S. Glaser, Cross-Strait Confidence Building: The Case for Military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Santa Barbara: Greenwood Publisher Group, 2005, pp.162-163. 史曉東，《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頁108-110。

45 Simon J. A. Mason, Matthias Siegfried,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CBMs) in Peace Processes, in Managing Peace Processes: Process related questions, A handbook for AU practitioners, Switzerland: Centre for Humanitarian Dialogue, 2013, p.59.

46 Siân Herbert, Lessons from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GSDRC Helpdesk Research Report 1131), Birmingham, UK: GSDRC, 2014, pp.4-6.

此的立場，建立協商、對話以緩和對立與緊張的形勢，避免產生誤解(misunderstanding)與誤判(miscalculation)，之後的工作便在有衝突傾向或緊張關係的國家之間維持一個溝通的管道，作為危機來臨時解除緊張的機制。

以東南亞國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為例。起初，ASEAN試圖學習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經驗在本地區建立信任措施，但各國普遍在政治、歷史分歧差異嚴重，澳大利亞學者蒂布(Paul Dibb)於1994年11月提出，應先建立信任感措施(Trust-Building Measures, TBMs)取代CBMs。⁴⁷對亞太地區來說，加強對話和政治上的信任是CBMs的前提，而建立信任感的措施包括軍事的內容，及非軍事的內容，其中多邊安全對話本身即是最重要的建立信任感措施，⁴⁸並強調綜合性安全，以建立信任為優先，而非軍事合作，透過政府與非政府機構諮商，並共同成立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SCAP)作為亞太安全第二軌道溝通的主要機制，⁴⁹藉由制度化區域對話的設立，逐步化解政治猜疑，建立軍事領域的溝通措施。

三、深化軍事熱線內容

雙方累積政治互信，並建立起各軍事層級的熱線機制之後，促進友好往來互動，便要訂定溝通的原則與內容。例如OSCE在初期發展階段訂定「自願性」(voluntary)通報小規模的軍事演習及接近邊境，基於自願的基礎，邀請他國觀察員參加軍事活動，促進東西陣營互動。⁵⁰發展期階段則進而規範情報交換、軍事活動規模及查證性措施，增加軍事資訊的透明化，強化歐洲各國的信心。⁵¹至於穩定期階段則設立各項合作性安全措施(Cooperative Security Measures)，包括將國防政策、軍事戰略、兵力計畫、軍事準則、主要武器裝備及部署等，列入公開項目，並設立「通訊小組」以強化成員國間之訊息傳遞。⁵²軍事交流必須循序漸進，逐步減緩衝突地區的軍事安全狀況，先就外部條件利用熱

47 David H. Capie and Paul M. Evans,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Lexicon*, Singapore: ISEAS, 2007, pp.245-246.

48 Desmond Ball, *A New Era in Confidence Building: The Second-track Proces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ecurity Dialogue*, Vol. 25, No. 2, 1994, pp.157-176.

49 Ron Huiskens eds., *CSCAP Regional Security Outlook 2018*, Australian: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4-6.

50 The Soviet insistence that the measures must be on 'a voluntary basis' was odd as the entire Final Act was a politically binding document, thus 'voluntary'. Nevertheless, the resulting 'double voluntariness' demonstrate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Soviet Union was reluctant to agree to the measures. UN Institute for Disarmament Research,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within the CSCE process: paragraph-by-paragraph analysis of the Helsinki and Stockholm régime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89, pp.6-12.

51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Yearbook 1991: World Armaments and Disarma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494.

52 Zdzislaw Lachowski, *Confidence- and Security-Building Measures in the New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46-66.



線溝通的方式達成協議，彼此相互理解與妥協後，才能再進而建立信心措施。

四、鞏固軍事協議結果

主要是針對兩國之間所建立的各項信任措施，以蒐集資料或派員實地進行勘察的方式，確認雙方對特定條約或協議的執行情形。國防白皮書與演習預告，是兩國都容易實踐的項目，但仍要進行透明性與查證性措施，以鞏固協議結果，增加信任度，避免有私下破壞協議的舉措，通常執行的方式是以監偵設備，透過單邊性的公告、預告，以及空中、地(水)面與水下等方式，或派遣專家進行實地勘驗外，⁵³並能夠請第三國擔任查證工作，無論是先由第三國查證或是由相對雙方實施查證，⁵⁴都必須依據預先擬定之相關作業程序進行。

亦可建制「衝突防制中心」(Conflict Preventive Center)執行信心與安全建構方案，主要機制為建立聯繫網絡、執行年度評估會議及協同處理軍事意外災難，⁵⁵驗證各項措施所遭遇的瓶頸，促進非常態軍事活動協商與合作。

截至2018年5月29日印巴兩國雙方指揮官利用熱線通話，審視喀什米爾協議和國際邊境線地區的情況，達成停火協議，雙方一致同意，一旦發生情況，雙方將保持克制並通過目前的熱線聯絡機制和軍事指揮官會議加以解決，⁵⁶終結長達70年的戰爭，開啟良好的契機。軍事熱線的設置目的並不在建立後，即可避免戰爭，而是在增加溝通管道，解決彼此之間的戰略性矛盾，降低誤判、誤解所引發戰爭的風險，並藉由以上的步驟及驗證，逐步擴大並深化區域性安全合作的措施，透過CBMs釐清雙方政治與軍事意圖，逐漸消弭其間不確定因素，在循序漸進的情況下，逐步落實軍事互信的概念，增加相互信任，而透過各國實踐的經驗可歸納出臺海間軍事熱線運作的原則，進而擘畫出具體措施，作為政策的考量，以消弭兩岸間的衝突或危機，開展和平的新契機。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一、史曉東，《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研

53 例如1988年成立的美國實地檢查局(US On-Site Inspection Agency, OSIA)查核了俄國對中程核武條約(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INF)的執行情形，該局監督了超過100處的前蘇聯與東歐軍事基地並持續監視俄國曾生產SS20型的飛彈工廠，並加以銷毀，另陪同蘇俄人員至美國銷毀潘興2型(Pershing 2)飛彈。Joseph P. Harahan, *On-Site Inspection Under the Inf Treaty: A History of the On-Site Inspections Agency & Inf Implementation, 1988-1991*, Darby: Diane Publishing Co., 1994, pp.42-43.

54 Simon J. A. Mason, Matthias Siegfried, op. cit., pp.74-75.

55 Niklas L. P. Swanström and Mikael S. Weissmann, *Conflict,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beyond: a conceptual exploration*, New York: Uppsal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9-22.

56 Suhas Munshi, News18, India, Pakistan Agree to End Ceasefire Violations in Hotline Contact as Signs of Diplomatic Thaw Become Clear, May 29, 2018, accessed on November 29, 2018, <https://www.news18.com/news/india/india-and-pakistan-agree-to-end-ceasefire-violations-after-hotline-contact-between-army-top-brass-1763249.html>

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

- 二、吳建德、張蜀誠、王瑋琦合著，《柳暗花明：兩岸軍事互信與和平協議之路》，〈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 三、沈明室，〈互信或防範？美中建立軍事熱線的意涵與挑戰〉，《戰略安全研析》，第32期，2007年。
- 四、林正義，〈台海兩岸『信任建立措施』芻議〉，《國防雜誌》，第13卷，第12期，2003年。
- 五、徐曉迪，〈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功能、挑戰及建言〉，《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32期，2011年。
- 六、郭添漢，《熱線—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建構》，〈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 七、郭臨伍，〈信心建立措施與兩岸關係〉，《戰略與國際研究》，第2卷，第1期，2000年。
- 八、湯紹成，〈略論兩岸軍事互信機制〉，《海峽評論月刊》，第219期，2009年。
- 九、楊永明、唐欣偉，〈信心建立措施與亞太安全〉，《問題與研究》，第38卷，第6期，1999年。

網路文獻

- 一、Suhas Munshi, News18, India, Pakistan Agree to End Ceasefire Violations in Hotline Contact as Signs of Diplomatic Thaw Become Clear, May 29, 2018, accessed on November 29, 2018, <https://www.news18.com/news/india/india-and-pakistan-agree-to-end-ceasefire-violations->

[after-hotline-contact-between-army-top-brass-1763249.html](https://www.news18.com/news/india/india-and-pakistan-agree-to-end-ceasefire-violations-after-hotline-contact-between-army-top-brass-1763249.html)

外文文獻

- 一、Aleksandr Fursenko and Timothy Naftali, Khrushchev's Cold War: The Inside Story of an American Adversa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7.
- 二、Aleksandr Fursenko and Timothy Naftali, One Hell of a Gamble: Khrushchev, Castro, and Kennedy, 1958-1964: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 三、Bonnie Glaser, Brad Glosserman, Promoting Confidence Building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ashington, D. 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8.
- 四、Bonnie Glaser, Brad Glosserman, Promoting Confidence Building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ashington, D. 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8.
- 五、Bonnie S. Glaser, Cross-Strait Confidence Building: The Case for Military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Santa Barbara: Greenwood Publisher Group, 2005.
- 六、Bonnie S. Glaser, Cross-Strait Confidence Building: The Case for Military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Santa Barbara: Greenwood Publisher Group, 2005.
- 七、Boutros Boutros-Ghali, Study on Defensive Security Concepts and Politic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3.
- 八、Daniel Wei Boon Chua, America's Role in



- the Five Power Defense Arrangements: Anglo-American Power Transition in South- East Asia, 1967–1971,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s*, Vol.39, No. 4, 2017, pp.615-637.
- 九、David H. Capie and Paul M. Evans,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Lexicon*, Singapore: ISEAS, 2007.
- 十、David H. Capie, Paul M. Evans and Akiko Fukushima, *Speaking Asia– Pacific Security: A Lexicon of English Terms with Chinese and Japanese Translations and a Note on the Japanese Translation*, Toronto: Center for Asia – Pacific Studies, 1998.
- 十一、Davinder Singh, “Hotline Communication: A Strategic Necessity” in Timothy R. Heath ed., *Developments in China's Military Force Projection and Expeditionary Capabilities*,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6.
- 十二、Desmond Ball, *A New Era in Confidence Building: The Second-track Proces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ecurity Dialogue*, Vol. 25, No. 2, 1994, pp.157-176.
- 十三、Helsinki Final Act, in a *Handbook of Document on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and Certain Aspects of Security and Disarmament*, Washington, D. C.: OSCE, 1975.
- 十四、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2011, pp.1-11.
- 十五、Holly Higgins, *Applying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in a Regional Context*, New York: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ess, 2002.
- 十六、Hugo Meijer, *The Reconfiguration of American Primacy in World Politics: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US Rebalance toward Asia*, New York : Springer Nature Press, 2015.
- 十七、James Krask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Security: The Role of Transboundary River Agreements as a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 (CBM) in South Asia?*,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8, 2003.
- 十八、Jeffrey M. Elliot and Robert Reginald, *The Arms Control, Disarmament, and Military Security Dictionary*, California: Borgo, 1989.
- 十九、John Borawski, “The World of CBMs” in John Borawski ed., *Avoiding War in the Nuclear Age: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for Crisis Stability*, Boulder: Westview, 1986.
- 二十、John Grenville and Bernard Wasserstein,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Treati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History and Guide with Tex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二一、Joseph L. Sheffield, *Military- to- Military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labama: Air 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 Air University Maxwell Air Force Base Press, 2009.
- 二二、Joseph L. Sheffield, *Military-to-Military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and*

- Cooper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labama: Air 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 Air University Maxwell Air Force Base Press, 2009.
- 二三、Joseph P. Harahan, On-Site Inspection Under the Inf Treaty: A History of the On-Site Inspections Agency & Inf Implementation, 1988-1991, Darby: Diane Publishing Co., 1994.
- 二四、Laurence Chang and Peter Kornbluh,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1962: A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ocument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9.
- 二五、M. Susan Pederson and Stanley Weeks, A Survey of Confidence and 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 in Ralph A. Cossa ed., Asia Pacific Confidence and 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 Washington, D. 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5.
- 二六、M. Susan Pederson and Stanley Weeks, A Survey of Confidence and 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 Washington, D. 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5.
- 二七、Marc Trachtenberg, Hist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二八、McGeorge Bundy, Danger and Survival: Choices About the Bomb in the First Fifty Yea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8.
- 二九、Michael Krepon, Khurshid Khoja, Michael Newbill, and Jenny S. Drezin, A Handbook of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for Reg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 C.: The Stimson Center, 1998.
- 三十、Michael Krepon, Khurshid Khoja, Michael Newbill, and Jenny S. Drezin, A Handbook of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for Reg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 C.: The Stimson Center, 1998.
- 三一、Niklas L. P. Swanström and Mikael S. Weissmann, Conflict,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beyond: a conceptual exploration, New York: Uppsala University Press, 2005.
- 三二、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2, 1997.
- 三三、Richard Ned Lebow & Janice Gross Stein,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三四、Ron Huisken eds., CSCAP Regional Security Outlook 2018, Australian: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017.
- 三五、Semyon Tsarapkin and Charles C. Stell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Regar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irect Communications Link, signed on June 20, 1963, at Geneva, Switzerland,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Vol.2, No.



- 4, 1963.
- 三六、Sheldon M. Stern, *The Week The World Stood Still: Inside The Secret Cuban Missile Crisis*, Stanford: Th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三七、Siân Herbert, *Lessons from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GSDRC Helpdesk Research Report 1131), Birmingham, UK: GSDRC, 2014.
- 三八、Simon J. A. Mason, Matthias Siegfried,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CBMs) in Peace Processes*, in *Managing Peace Processes: Process related questions*, A handbook for AU practitioners, Switzerland: Centre for Humanitarian Dialogue, 2013.
- 三九、Simon J. A. Mason, Matthias Siegfried,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CBMs) in Peace Processes*, in *Managing Peace Processes: Process related questions*, A handbook for AU practitioners, Switzerland: Centre for Humanitarian Dialogue, 2013.
- 四十、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Yearbook 1991: World Armaments and Disarma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四一、The Soviet insistence that the measures must be on 'a voluntary basis' was odd as the entire Final Act was a politically binding document, thus 'voluntary'. Nevertheless, the resulting 'double voluntariness' demonstrate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Soviet Union was reluctant to agree to the measures. UN Institute for Disarmament Research,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within the CSCE process: paragraph-by-paragraph analysis of the Helsinki and Stockholm régime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89.
- 四二、USAF Historical Division Liaison Office, *The Air Force Response to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Washington: Headquarters USAF Press, declassified by 2011.
- 四三、Victor Yves Ghebail,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Defusing the Cold War*, in a *Handbook of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for Reg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 D. C.: 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1998.
- 四四、Zdzislaw Lachowski, *Confidence- and Security-Building Measures in the New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四五、Zdzislaw Lachowski, Martin Sjogren, Alyson J. K. Bailes, John Hart and Shannon N. Kile, *Tools for Building Confidenc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Sweden: Th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07.

作者簡介

李彥璋中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國防大學管理學院法律學系碩士。曾任國防部法律事務司法制官、海軍基隆後勤支援指揮部法制官、國防部空軍司令部法制官。現任職於陸軍馬祖防衛指揮部中校法制官。